

汉魏六朝“檄”体文综述

王晓静

(厦门大学中文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 汉魏六朝时期是檄文发展的兴盛时期, 出现了大量的檄体作品。檄文从纯功利性质的军事文告到文学欣赏的审美对象, 这过程中既显示出发展的阶段性特点, 又出现了檄体文的传世名篇, 多方面为后世檄文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 汉魏六朝; 檄文

檄文, 是古代一种军事性文告。最早将檄作为一种文体专门加以研究, 肯定其军事性公文性质的是刘勰《文心雕龙·檄移篇》。《释文》:“檄, 军书也。”《说文》云:“以木简为书, 长尺二寸, 用以号召; 若有急则插鸡羽而遣之, 故谓之羽檄, 言如飞之急也。”明朝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其他, 报答谕告, 亦并称檄; 故取以附焉。又州邦徵吏, 亦称为檄, 盖取明举之义, 而其词不存, 无从采录, 姑附其说于此。”大抵檄文是军事活动前的声讨性文章, 以“激发人心而论祸福”(张表臣《珊瑚钩诗话》); 有时也用于报答谕告、征召。其风格特和写作方法前人亦有论述, 但多是沿着刘勰的精神加以发挥。李充《起居戒》曰:“檄不切厉则敌心陵, 言不夸壮则军容弱。”徐师曾曰:“若论其大体, 则刘勰所称‘植义风辞, 务在刚健。或述此休明, 或叙彼苛虐。指天时, 审人事, 算强弱, 角权势。标蓍龟于前验, 悬盘铭于已然。插羽以示迅, 不可使辞缓; 露板以宣众, 不可使义隐。此其要也。’可谓尽之矣。”^[1]然而, 古代公文的研究一直是学术领域较为薄弱的环节。现存某些《昭明文选》版本中将司马相如《难蜀父老》归入檄体让后世对檄、难文体颇有争执; 对“意用小异而体义大同, 与檄参伍”的移体, 同是用于军事文告且较相近似的露布也有混淆不清的说法。因此, 本文拟对檄文发展过程中极为重

要的阶段——汉魏南北朝时期出现的檄文予以梳理, 对其阶段性特点作简要综述, 希图对檄文有较清楚地认识。

一

北齐颜之推:“文章者, 原出五经。诏命策檄, 生于《书》者也;”^[1]应该说, 《尚书》中已经出现檄文的雏形。《甘誓》:“大战于甘, 乃召六卿。王曰:‘六事之人, 予誓告汝: 有扈氏威侮五行, 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恭行天之罚……’”这是在出征之前宣训众人, 显示军威, 点明征讨的原因及正义性, 初步具备了檄文的功用。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有明确的概括:“昔有虞始戒于国, 夏后初誓于军, 殷誓军门之外, 周将交刃而誓之。故知帝世戒兵, 三王誓师, 宣训我众, 未及敌人也。”^[2]用语简洁朴实, 起的作用尚止于“宣训我众”, 未若后世檄文对他方的指斥。

以宗经、征圣为旨, 刘勰亦认为檄之本源存于《左传》中。“六经, 象天地, 效鬼神, 参物序, 制人纪, 洞性灵之奥区, 极文章之骨髓者也。……纪传铭檄, 则春秋(案: 此指《左传》)为根。”^[1]在《檄移》篇中, 他明确指出“至周穆西征, 祭公谋父称:‘古有威让之令, 令有文告之辞’”、“及春秋征伐, 自诸侯出, 惧敌弗服, 故兵出须名, 振此威风, 暴彼昏乱; 刘献公之所谓‘告之以文辞, 董之以武师’者也。齐

桓征楚，诘苞茅之阙。晋厉伐秦，责箕郢之焚。管仲吕相，奉辞先路，详其意义，即今檄文”。^[2]春秋之际师出必有名，《左传》中管仲责楚使“尔贡苞茅不入”之言及“吕相绝秦”篇，皆为诡谲之辩，善用夸张、比喻，以确立征伐是符合礼仪和正义的举动，声势俱厉，确是檄文的风格。刘勰以《左传》为檄文的本源，颇有道理。

“檄”之名正式出现，始于战国。《史记》载张仪为檄以告楚相曰：“始吾从若饮，我不盗而璧，若笞我；若善守汝国，我顾且盗而城”^[3]是也。作檄的起因在张仪游说诸侯之时，楚相怀疑其盗璧而笞数百；又《汉书》曰：“申屠嘉为丞相，邓通居上旁，怠慢，嘉为檄召通曰：不来且斩，通恐，入言於上，上曰：速往，吾令召汝，通至丞相府，免冠徒跣顿首谢。”^[3]“檄”之名始著。然而这两件事似乎都只是因私人纠葛引发，文章也不完全具备后代檄文军事方面的意义。

《汉书·高帝纪》：“吾以羽檄征天下兵。”颜师古注：“檄者，以木简为书，长尺二寸，谓之檄，用征召也。其有急事，则加鸟羽插之，示速疾也。”可见，此时的檄文已开始用于军事目的。汉代以后，檄文成为正式的文体形式。

西汉流传下来的檄文不多，有南越王赵佗《移檄告横浦阳山湟谿关》“盗兵且至，急绝道聚兵自守”（《史记·南越王尉佗传》），今仅存短短十一字，难见原文全貌；有司马相如所作《喻巴蜀檄》和朱博《口占檄文》。（注：司马相如《难蜀父老》存于《昭明文选》中，其归类颇有争议，本文存疑不议）《口占檄文》仅二十来字，句式简单，全为命令式口吻，文学性不大。《喻巴蜀檄》则是现存最早的完整的檄文。文中先叙武帝武功，继而说明“发军兴制，惊惧子弟，忧患长老”，皆非陛下之意，谴责巴蜀守臣不明上意及巴蜀臣民的骚动。这篇作为文告的檄文显然受到当时赋体文学的影响，形容汉武军威即以北征匈奴、移师东指，右番禺等铺排，说明周边对汉朝的景仰则述以“常效贡职，不敢怠，皆向风慕义，欲为臣妾”。^[4]文章“齐整而重修饰的文风、周密而层层推进的陈述、从容生动的行文无不隐隐露出汉赋的濡染”^[7]。但是，这篇檄文仍算不得典型意义上的檄文。《喻巴蜀檄》的成因是“唐蒙使略通夜朗，蝇，征发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未发转漕万余人，用军兴法，诛其渠率，巴蜀人大惊恐。上闻之，乃遣相如责唐蒙

等，因喻告巴蜀人以非上之意也”。^[4]褚斌杰称“它代表了早期檄文的性质，即不专用于征讨，可以作为一般文告使用”，^[5]刘勰在《移檄篇》里也未提及它。檄文的目的是要在敌我军事活动之前，具有示威、警告、征召、晓谕的作用，此文安抚、教谕之意占多。“逆党用檄，顺命资移”，其题为“檄”，却是介于檄、移之间的。但是，《喻巴蜀檄》却为檄文在后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行文上，以散为主，间有对句呈现出注重修饰、走向整齐的趋向，文学色彩加深了。这正是六朝檄文发展的前殿。

《文心雕龙·檄移篇》里提及的、符合刘勰标准的檄文最早是东汉隗嚣的《檄亡新》。东汉时期有关“檄”的记载也渐多。《东观汉记》曰：“光武数召诸将，置酒赏赐，坐席之间，以要其死力，当此之时，贼檄日以百数，忧不可胜，上犹以馀闲讲经艺”。又曰：“隗嚣，故宰府掾吏，善为文书，每上书移檄，士大夫莫不讽诵”。又曰：“庐江毛义，少时家贫，以孝行称，南阳张奉慕其义，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适至，以义守令，义奉檄而入，喜动颜色。”^[3]可见，此时檄文除却其原有的实用目的外，已具有一定的审美性和审美功用。

隗嚣《移檄告郡国》开篇道：“故新都侯王莽，慢侮天地，悖道逆理。鸩杀孝平皇帝，篡夺其位。矫托天命，伪作符书，欺惑庶，震怒上帝。反戾饰文，以为祥瑞。戏弄神只，歌颂祸殃。楚、越之竹，不足以书其恶。”^[6]接着历数王莽逆天、逆地、逆人之罪状，对其昏乱、苛虐予以充分的暴露和斥责。文直意明，极有气势。刘勰评价道：“布其三逆，文不雕饰，而辞切事明，陇右文士，得檄之体也。”^[2]的确，檄文的基本特点，在此篇中得到淋漓尽致地展现。

二

如果说汉代是檄文的形成时期，三国时期则是檄文的兴盛时期。东汉末年，中原混战，诸方棋峙，其间英才辈出。檄文这种用于军事活动前的公文，此时无论在数量或内容上都达到一个高峰。《昭明文选》中收录檄文名篇——陈孔璋《为袁绍檄豫州》《檄吴将校部曲文》，钟士季《檄蜀文》皆作于此时。史载阮武亦“擅长符檄，文思敏捷，下笔倚马可待”。此外还有王粲《为荀与孙权檄》今存数语，略见气势；繁钦《为史叔良作移零檄》短而精，董昭《伪绍檄千郡》、虞松《檄告公孙渊》等，只有数句，简洁朴实。《魏志》曰：“孙放善为书檄，三祖谕命招喻，多放所

为^[4]。惜少见传世。陈琳《檄豫州》无疑是这当中扛鼎之作。文中以大量篇幅对曹操“豺狼野心，潜包祸谋，乃欲摧桡栋梁，孤弱汉室”的罪状予以揭露，对曹操出身、品德、用兵等多方面丑行一一揭发，甚而不惜笔墨巧言诬其“破棺裸尸，掠取金宝”。这些都是为了激发州郡公愤，为袁绍伐曹操正名。檄文在后半部以颇为夸饰之笔对曹操和袁绍的军事力量作比，矜夸己方的兵强马壮，映衬敌方人心涣散，务在压倒敌方气势；最后再以颇富号召力和鼓动性的文字作结。全文铺张扬厉，感情强烈。史载曹操“先苦头风，是日疾发，卧读琳所作，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三国志》裴注引《典略》）《檄豫州》的效用可见一斑。“这篇檄文，表现了古代一般征讨性檄文的性质和体制。”^[5]

陈琳《檄豫州》不仅是三国时期檄文特点的代表之作，也成为后世檄文的典范。与此前后的檄文相较，它明显具有了特定的时代特色。

汉末连连战乱和饥荒，死亡是当时人们心理上无法摆脱的阴影。士人们希图在有限的生命中取得功业以获得不朽。士人们建功立业的抱负和个体价值充分实现的渴望，对生命无常的慨叹与对不朽追求，形成了建安文章慷慨悲凉之气。传统的纯军事性文告的檄文，也成为士人实现自身理想、抒发心中情感的一种途径，檄文中融进了时代慷慨任气的特色。写作主体一是自觉追求形式的美，注重文句的修饰，用典、对偶、排比、夸张、比喻，张扬其辞，以散为主，但大量骈丽语词运用在檄文中，整齐的句子，排比的句式，造就了宏大的气势。二是介入议论、抒情等多种表达方式。《檄豫州》开篇即是“盖闻名主图危以制变，忠臣虑难以立权。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立非常之功。夫非常者，故非常人所拟也。”^[4]此段议论立足处极高，气势逼人，又开启了下文的用典明事，灵活转承；文章布局层层推进，开合自如。刘勰曾称《檄豫州》“壮有骨鲠”，意即文中感情充沛，文辞端正刚直，其气壮大、慷慨。这与陈琳倾注饱满的感情入文章不无关系。《檄豫州》结尾：“书到，荆州便勒兵，与建忠将军协同声势，州郡各整戎马，罗落境界，举师扬威，并匡社稷，则非常之功，于是乎著。”行文既动之以情，直白坦率，充满号召力和煽动性；又要让敌方畏己之势，故而恩威并重，不乏威吓之辞。文句既讲究又以自然之态呈现，檄文的审美性大大增强了。这种审美性不仅是作者

的自觉追求，也是社会普遍的欣赏趣味对檄文的要求。如果说东汉隗嚣之檄文“士大夫莫不讽诵”已体现出当时人已开始从审美角度欣赏檄文的话，至三国时期，时代对美的呼唤增强了，檄文因着上述的发展更具备了审美特性。《昭明文选》中所录此时的几篇檄文，无一不是以“辞令之妙”闻名天下。

这些方法被后世檄文所继承，基本按照此时期拓出的路向前发展。时代特有的慷慨之风在檄文中造就的矜壮奋发的文气、壮骇扬厉的风格是檄文体本身所需要，也是后世檄文作者极力追求的。

晋、南北朝时期，战事频繁，檄文在数量上仍有可观。有晋孙惠《为东海王讨成都王檄文》，庾阐《为郗鉴檄青州文》《檄李势文》《为檄石虎文》，桓温《檄胡文》，王永《宣檄州郡》，南齐丘巨源《驰檄数沈攸之罪恶》，梁朝萧颖胄《移檄京邑》，侯景的文士王伟《传檄荆州》，梁元帝《伐侯景檄文》，裴子野《喻虜檄文》，任恭孝《为汝南王檄魏文》，王僧辩《檄》，后魏魏收《檄梁文》（《全北齐文五》据《文苑英华》六百四十五，《通鉴》一百六十作杜弼文）；陈朝徐陵《檄周文》等。

总的而言，此时期的檄文基本未有超越陈琳檄文之作。有的因袭前代手法，少有突破；有的堆砌辞藻，伤于繁复，甚而字句难懂；有的虽长篇累牍，然终究气势平平。刘勰提到“桓公《檄胡》，观衅尤切”，仍是檄文的壮笔。但此时期檄文总体成就不甚高，在后世文坛上影响不甚大。

不可否认的是，檄文作为一种文体类型不同于其他文学作品，其写作题材的确具有某种特定性，所以后代往往是在形式上做着突破的努力。从这个角度而言，晋、南北朝时期在檄文发展史上是有其重要作用的。

受时代对美自觉追求的风气影响，随着声律的发现等，檄文渐已成为文学欣赏的对象。檄文内容虽不外乎揭露敌方残暴，扬己方军威，但多用四字句，且讲究音韵、平仄和谐，注重对仗，极力追求行文辞令的美感。六朝时期骈文盛行，朝廷对问、公文行书，往往亦能令能文之士以骈文撰写，发展到唐朝骆宾王《为徐敬业讨武曌》那里，则全文用四、六句或对仗句组成。引用先王圣贤、史实典故来证明维护论点本是常用的传统手法，此阶段对用事也提出了要求。史实、典故不仅要灵活化文中，也十分雕凿运用时的文采。如魏收《檄梁文》全篇大量引证史实，句式却修饰整饬，“拒此则作气不足，攻彼则为势有馀，呼之

则返速而衅小,不怨则叛迟而祸大,但恐楚国忘猿,祸延林木,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横使江黄士子,荆杨人物,死亡矢石之下,夭折露雾之中,人人厌苦,家家思乱^[3]。读来朗朗上口。更为典型的当属王伟《传檄荆州》“项羽重瞳,尚有乌江之败;湘东一日,宁为四海所归”。四六之体,“连公文的体式都省下了,只以典故喻战^[7],其用典和辞令特色,可见一斑。这些莫不体现了六朝人的唯美追求,“湘东草檄,非关序贼,文多夸浮,贤者不免。”对形式文采的过分追求,有时也造成繁冗复杂,文句繁复却无助于加深文意,文虽锦绣但乏于骨力。这不能不说与檄文的目的,是让广大受众得到激发和鼓舞有偏差。檄文是有着特定实用目的的公文,本是“奉辞伐罪”,其为军事活动服务的属性贯穿始终的。但在极端崇尚美与自然推崇形式美的六朝人笔下,突破了公文的古板模式,要求檄文亦是美文。

随着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满清王朝的灭亡,檄文这种封建帝制时期使用的公文文体,也由布告、通告、声明等新的公文体式所取代。此种公文写作上要求真

实准确,切忌夸张,更无须极力追求艺术感染力和审美特性。时代变更,要求也变化了。

参考文献:

- [1](明)徐师曾 文体明辨序说[M]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 [2](南北朝)刘勰原著陆侃如、牟世金译注 文心雕龙译注[M] 齐鲁书社,1981
- [3](唐)欧阳询撰,汪绍楹校 艺文类聚:卷五十八 杂文部四[M] 中华书局,1965
- [4](梁)萧统编(唐)李善注 昭明文选[M]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 [5]褚斌杰 中国古代文体概论[M]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 [6]严可均校辑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M] 中华书局,1958
- [7]麦婕 汉魏六朝檄文形式的创造性转化[J] 广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03 年 6 月

责任编辑:马春玲

(上接 98 页)

阶层立场的是作家王朔,他所代表的是对 80 年代以来现实充满怨恨的文革“大院子弟”。^[4]在 80 年代大现实环境中,他们失去了曾经有过的自由和放纵,很自然地对现实大变革感到强烈大失落,于是,嘲弄一切权威和精神,反抗过去也拒绝未来,成为他们面对社会的基本方式。

当然,笼统地以“小资”文学来命名后两类文学阶层显然是失当的。但不管以何种名目来定位他们的作品阶层,阶层本身的存在都不会受到影响,因为名目只是符号,而他们的文学作品所指代的阶层的存在是事实,而这种存在又恰恰印证了文学的阶层视角的存在。在此意义上,著名心理学家荣格在评述歌德时说的这段话非常精辟,在揭示了文学创作与时代之间的密切关系时正说明了文学性阶层视角的存在:“不管这些诗人的意义如何,他们每一个人都是用成上万人

的声音说话。预告他那个时代中自觉意识观念所发生的变化。”^[5]

参考文献:

- [1][美]乔纳森·卡勃著,李平译 当代学术入门·文学理论第 23 页[M],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
- [2]朱立元主编 美学[M]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 [3]汪继芳编“断裂”:世纪末的文学事故[M] 江苏文艺出版社,2000
- [4]王朔 我的小说[J] (引自《人民文学》,1989.3).
- [5]荣格 心理学与文学[M] 北京:三联书店,1987

责任编辑:马春玲